

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程

中国现代史纲

上册



高 · 等 · 师 · 范 · 专 · 科 · 学 · 校 · 教 · 程

K26

55

2:1

中国现代史纲

ZHONG GUO XIAN DAI SHI GANG

傅绍昌 编 著
蒋景源

上 册

安徽 **B** 556100 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夏秀流
封面设计 吴 燃

中 国 现 代 史 纲
(上册)

傅绍昌 蒋景源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80,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4,200

统一书号: 7276·634 定价: 2.25元

编者的话

一、为了适应高等师范院校教学发展的需要，在国家教育委员会文科教材办公室的支持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组织编写了本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程《中外通史》（包括《历史教学法概论》）。这套教材主要作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文科各系教材之用，也可供高等师范院校和其他高校有关系科教学参考之用。

二、本套教材从师专文科实际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在体系和内容方面进行了新探索。注重给学生以通史的基础知识和历史学基本理论，并反映出最新科学成果，在结构上还增加“本章提要”、“思考题”、“参考书”等自学辅导性材料。

三、本套教材共分七个分册：中国古代史纲，中国近代史纲，中国现代史纲，世界古代史纲，世界近代史纲，世界现代史纲和历史教学法概论。每分册约四十万字。

四、本套教材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为了保证书稿质量，特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外通史教材编纂委员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崇武教授任编委会主任，林炯如教授和王斯德副教授任编委会副主任。编委由下列同志组成（以姓氏笔划为序）：丁季华、王家范、王斯德、尤天然、孙道天、陈崇武、陈雪良、陆满堂、吴振棣、周荣显、林炯如、金相成、洪波、夏秀流、钱洪、程纯、傅绍昌、虞宝棠、蒋世弟、蒋景源。

目 录

第一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
第一节	“五四”前夜的中国社会	(3)
第二节	“五四”爱国运动	(17)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27)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44)
第二章	北洋军阀混战的加剧，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发展	(50)
第一节	帝国主义侵略的重新加紧和北洋军阀混战的加剧	(52)
第二节	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60)
第三节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农民运动的兴起	(66)
第四节	国共合作的酝酿	(73)
第五节	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和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	(80)
第三章	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88)
第一节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90)
第二节	北京政变和国民会议运动	(98)
第三节	“五卅”运动和全国反帝斗争高潮	(104)
第四节	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116)
第五节	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斗争	(131)
第四章	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溃败，国民革命的失败	(138)
第一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140)
第二节	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150)

第三节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60)
第四节	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167)
第五节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的失败·····	(174)
第五章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兴起 ·····	(185)
第一节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	(187)
第二节	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6)
第三节	国民党军阀的大混战·····	(206)
第四节	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	(212)
第五节	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及其活动·····	(223)
第六章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全国人民抗日民主 运动的起伏·····	(230)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231)
第二节	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 的形成·····	(248)
第三节	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扩张，全国抗日反蒋斗争的 曲折发展·····	(258)
第四节	苏维埃区域革命的深入和各项建设·····	(272)
第五节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279)
第六节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289)
第七章	华北事变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	(305)
第一节	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	(306)
第二节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315)
第三节	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326)
第四节	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	(341)

第 一 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本章提要】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心内容是“五四”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学习本章应着重掌握如下问题：

（一）“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和历史条件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枢纽。它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条件。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民族危机和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基本原因。国内工人阶级的壮大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影响，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做了思想准备。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二）“六三”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从1919年5月4日开始到6月28日取得重大胜利为止，其历史进程以“六三”为界限划分为两个阶段。6月3日以前，运动的中心在北京，主力是青年学生；6月3日以后，运动的中心在上海，主力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崛起的主要标志是“六三”大罢工。以上海工人为中心的这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表现出许多新

的特点，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对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摆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作为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爱国运动推进了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思想武器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从1919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思想战线上，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扩大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四）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最伟大的功绩在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五四”以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六三”工人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决心投身于工人运动，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从1920年8月起，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采取多种形式，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第一节 “五四”前夜的中国社会

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革命政权很快就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地主、大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和北洋军阀的卖国残民，日益发展和尖锐起来。

袁世凯是个权欲和野心极大的军阀。他上台后便撕下“拥护共和”的假面具，残酷镇压革命民主势力，进而帝制自为。经过一番筹划，袁世凯于1915年12月宣布改称帝制。这个倒行逆施的丑恶行径，立即激起了全国性的反袁风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同年6月6日，在忧惧中病死。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失去了共同的走狗，于是各自寻找和扶植一部分军阀，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军阀集团则分别投靠各帝国主义，自成派系，割据称雄。在北洋军阀系统中分裂成三大派系，即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投靠日本；以冯国璋为头子，冯死后以曹錕、吴佩孚为头子的直系，投靠英美；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也投靠日本。此外，还有晋系、滇系、桂系等割据一省或两省的地方军阀。在各派军阀中，势力最大的是皖、直、奉三系。他们是中国反动统治的主角，在以后的十年中，曾先后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

1916年6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独揽政府大权。黎元洪则以

英美为后台对抗段祺瑞。这样就形成了所谓“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这一斗争在中国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尖锐地爆发出来。1917年初，日本为了控制中国，竭力促使段祺瑞对德宣战，段祺瑞则想利用参战名义扩充实力，排除异己。仰仗美、英支持的黎元洪害怕段祺瑞势力扩大，反对参战，并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段愤而离京赴津。6、7月间，段祺瑞暗中支持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接着，段又实行“讨逆”，驱逐了张勋。然后，由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则以“再造共和”的元勋自居，又一次出任国务总理，总揽大权。段祺瑞政府对外进一步投靠日本，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德宣战；对内拒绝恢复张勋复辟时期被抛弃的国会和《临时约法》，组织所谓临时参议院，玩弄共和招牌，实行独裁统治。

孙中山看到段祺瑞以假共和欺骗全国人民，于是提出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的主张，号召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7年7月上旬，孙中山离开上海南下广州护法。随后联合了滇、桂等地方军阀，在9月10日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任元帅。

对南方护法军政府，段祺瑞出兵“讨伐”，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但直系军阀则沟通南方军阀，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以排斥段祺瑞。在这种形势下，段祺瑞被迫辞去国务总理职务。直系军阀的所谓南北和平解决的主张，诱发了西南军阀的野心。他们为了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北洋军阀把持的中央政府中取得一席之地，便与北洋军阀妥协，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1918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去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段祺瑞虽然被迫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但仍以“参战督办”名义指挥皖系军阀搞“武力统一”，并勾结奉军进驻直隶，威胁冯国璋。1918年3月，冯国璋只得再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

重新上台后，“武力统一”的气焰更为嚣张，但遭到直系将领的抵制。8月21日，吴佩孚发布通电，请罢内战。这样，直、皖两系的争斗愈演愈烈。9月4日，段祺瑞指使安福国会另选前清老官僚徐世昌为大总统，把直系头目冯国璋逐出中央。10月，钱能训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但北京政府实际上仍由段祺瑞把持。

北洋军阀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卖国政策。他们不仅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和帝国主义缔结了一系列新的卖国条约，拍卖国家主权。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进行卖国的借款。1913年4月，他以盐税全部收入作抵押，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进行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借款”。1913年至1914年的两年间，袁世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二十次，共达三亿七千万银元，帝国主义从中获取了控制中国田赋收入和建筑铁路等项权益。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和美国乘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入山东，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1915年1月，日本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急于称帝的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竟于5月9日，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了日本的侵略要求。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当政的几年里，签订的卖国条约达一百多个。袁世凯倒台后，日本又把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在自己手里。段祺瑞为了扩充实力，在对德宣战后，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大量借款。仅一年时间里，就从日本借得总额为五亿日元的“西原借款”，日本则攫取了东北、华北的大量权益。俄国十月革命后，1918年5月，段祺瑞又和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取得了战时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并把七、八万军队开入中国东北。同年9月，段政府对满足日本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卖国文书——《中日山东问题换

文》，竟无耻地表示“欣然同意”。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加深了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特别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北洋军阀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祸国残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袁世凯上台的一年内，就杀害了二千多名革命党人，1913年3月又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宋被刺杀后，孙中山决心“非去袁不可”，于7月发动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立即出兵“讨伐”，把二次革命镇压下去。随后，又派二十万大军镇压了白朗起义。段祺瑞把持北京政权后，同样实行军事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对人民实行疯狂的掠夺。各派军阀都是大地主的代表，他们有的本身就是大地主。如袁世凯在河南占有土地四万亩左右，冯国璋在苏北占有土地七十七万亩，张作霖在东北占有土地一百五十万亩。土地日益集中，农民纷纷破产。各派军阀为了进行战争不断扩充军队，这就使军费开支日益膨胀。1923年，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竟占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四。军费猛增又造成农民赋税的加重，从1912年到1919年，田赋增加了七倍，盐税和烟酒税增加三倍，印花税增加六倍。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内战不息。在混战中，军队抢劫骚扰，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给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破坏和无穷灾难。这一切使得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

总之，由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得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这就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二、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

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空前迅速的发展。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针织、卷

烟、榨油等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重工业虽然发展缓慢，但在煤、铁、机械制造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增长。据统计，1912年至1919年，中国新建的近代工业厂矿多达四百七十余个，投资近九千五百万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八年间新增的资本，至少达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辛亥革命前五十年投资的总和。这就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了它在华的经济势力。从1913年至1920年，日本在华商家由一千二百六十九家增至四千二百七十八家。日本在华经济势力已超过英国而居于各帝国主义之首位。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是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新的巨大压力和障碍。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发展成长起来。从资产阶级来看，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数目有所增加，据1918年统计，国内商会会员有十六万二千余人，华侨商会会员有两万一千余人。从学生群众来看，中国受过新式教育即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人数也大为增加，据估计，“五四”前夕，全国受过新式小学教育者近千万，受过中等教育者当在十万以上，受过高等教育者也有数万之多。此外，在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留学生也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从工人阶级来看，据1913年的统计，产业工人为一百多万，而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则达到二百多万人，五年间猛增了一倍。此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约一千二百万人。这样，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①

在这个壮大了的阵营里，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

^①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代表，是中国社会最先进、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它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自己的一些特殊优点：第一，集中在沿海少数大城市的大企业中，便于组织和团结，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第二，多数为破产农民出身，与广大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第三，特别是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其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而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当然，由于它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难免有着一些弱点，如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低，它还受着封建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等。但这些弱点与其优点相比，只是次要的方面。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诞生那时起，就以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姿态进行着战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罢工的次数显著增加。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一百三十余次，比辛亥革命前七年间的罢工次数增加一倍多。特别是从1916年以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这一年为十七次，1917年二十三次，1918年增加到三十次，1919年头五个月就达十九次。罢工规模扩大，斗争水平显著提高，有些罢工都有几千人参加，带有同盟罢工性质的罢工斗争日渐增多，出现了萌芽状态的工会组织，并且开始由经济斗争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其中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和1916年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政府的运动，上海、天津等地的工人都积极参与了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战斗能力的加强，表明它已处在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前夜。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

础，也是“五四”运动成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因素。

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在经济上要求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在政治上要求改变中国的现状。于是从1915年开始，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中，掀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也是辛亥革命以来民主思想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称《新青年》），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掀起了思想革命的巨浪。《新青年》杂志的创办，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一般被称为启蒙运动，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以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向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

民主，在《新青年》创刊号里被称为“人权”。陈独秀当时最醉心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权说。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①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②他热情歌颂“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把“自由、平等、博爱”看作“近代文明”之精

^①见《五四运动文选》第3页。

^②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华。根据这种观点，陈独秀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提出了较辛亥革命远为彻底的政治主张。他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代之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并且认为实现国民政治的“唯一根本之条件”，是多数国民在政治上“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①。李大钊对封建专制制度更是深恶痛绝，他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为此，他把凡是复辟专制制度之辈一律视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②并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站在民主自由的前列，为创建“青春之国家”^③而奋斗。

基于这种民主主义观点，在反对专制的同时，新文化运动还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封建文化展开了全面的空前的猛烈批判。在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中，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鲁迅等相继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痛斥孔教是“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已不适应现代生活；“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提倡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儒者三纲之说”、“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是“奴隶之道德”，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必须彻底打碎；封建礼教、道德是吃人的礼教、道德，“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总之，在这些战将们看来，这种旧的封建礼教道德、政治文化，是造成国家衰退、国耻丛生的原因，如不加以彻底扫除，就无法实现民主政治。他们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

①《吾人最后之觉悟》，《五四运动文选》第16页。

②《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175页。

③《青春》，《李大钊文集》（上），第204、205页。

“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①充分显示出与封建文化彻底决裂的精神，并与之斗争到底的决心。

第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举起的另一面大旗。作为封建迷信对立物的科学，同民主一起，从《新青年》创刊就提出来了。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②这就是说“科学”与“民主”同样重要，好比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当时，先进思想家们提倡科学，主要还不是提倡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指发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陈独秀十分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主张“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迷”，认为“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③同时他还宣传唯物论，承认感觉是反映客观的。他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④“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⑤李大钊也阐明了唯物论的基本问题，他认为宇宙是“自然的存在”，“真实”的“本体”。客观世界是一个物质的“大实在”，而绝不是什麼“神秘主宰”的东西。^⑥从唯物论的根本观点出发，他们对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宗教”的口号，呼吁向一切“骗人的偶像”作斗争。他用自然科学的原理证明无形无质的鬼神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宗教，

①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第264页。

②见《五四运动文选》第7页。

③《再论孔教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53页。

④《有鬼论质疑》，《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77页。

⑤《敬告青年》，《五四运动文选》第7页。

⑥《李大钊选集》第79页。